

跨世纪文论丛书



许道明 著

中国现代文学 批评史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中国
现代文学
批评史

(苏)新登字 007 号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作 者:许道明

责任编辑:朱建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宜兴市南漕彩印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4

字数:370,000 199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812-7/I·775

定 价:1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导 论	(1)
第一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先导	(11)
第二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滥觞	(19)
一 《新青年》批评家	(19)
二 胡适	(28)
三 周作人	(39)
第三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建立(一)	(53)
一 人生派批评家	(53)
二 沈雁冰	(63)
三 郑振铎	(73)
四 叶圣陶	(82)
第四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建立(二)	(90)
一 艺术派批评家	(90)
二 郭沫若	(98)
三 成仿吾	(109)
四 郁达夫	(121)
第五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深入(一)	(135)
一 新人文主义批评家	(135)
二 闻一多	(143)

三	梁实秋·····	(151)
第六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深入(二)·····	(163)
一	革命文学批评家·····	(163)
二	蒋光慈·····	(170)
三	钱杏邨·····	(176)
第七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一)·····	(186)
一	“左翼”文学批评家·····	(186)
二	冯雪峰·····	(195)
三	瞿秋白·····	(204)
四	鲁迅·····	(213)
五	茅盾·····	(223)
六	郑伯奇·····	(235)
七	巴人·····	(242)
八	洪深·····	(252)
第八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二)·····	(263)
一	京派文学批评家·····	(263)
二	朱光潜·····	(273)
三	沈从文·····	(284)
四	李健吾·····	(295)
五	梁宗岱·····	(305)
六	李长之·····	(312)
七	萧乾·····	(320)
第九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三)·····	(328)
一	朱自清及其他批评家·····	(328)
二	朱自清·····	(340)
三	熊佛西·····	(354)

四	李何林	(365)
五	苏雪林	(372)
六	傅东华	(381)
第十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四)	(391)
一	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学思想论争	(391)
二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401)
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410)
第十一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重塑(一)	(418)
一	民主根据地批评家	(418)
二	周扬	(425)
三	何其芳	(437)
第十二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重塑(二)	(448)
一	国统区与香港地区的批评家	(448)
二	胡风	(458)
三	以群	(473)
四	邵荃麟	(482)
五	李广田	(491)
第十三章	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500)
后 记		(508)

导 论

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在本世纪初进入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它们所反映出的文化审视和估量，表现了竭力摆脱固有传统的羁绊、向世界寻求共同话语系统的巨大热情。同对待现代中国一般文化一样，有人已经或企图用“断裂”、“裂变”之类描述现代批评和传统批评大异其趣的景观。凡此种努力是不难理解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神往于“五四”前后中国文学批评对西方近现代学术文化的渴望和扫荡固有传统的淋漓之气。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巨人傲视以往和向往新锐的神情往往会动人心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化仅仅演出了它的序幕，它的转换过程并不因为临将跨进二十一世纪而完成。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气象万千，非常有意思的是，来自异域它邦各色名目的“主义”犹如过江之鲫，颇有些“五四”时期的景象。这些“主义”大半在以往的历史时期先后显过身手，不过此番已具备整体的性状。发生在本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文学潮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语言学与风格批评、有机形式主义批评、神话批评，以及新的哲学批评——在中国或继续安营扎寨，或全线登陆。比如本文、肌质、结构、功能、张力、反讽、原型、“细读”……这些形

式概念范畴虽早已在西方产生，却在今天中国的批评界叠床架屋地出现，获得大批稍为年轻的批评家的同情和迷恋。当然，也出现过某些极度膨胀文学独立自足地位的企图，但多数倒是相当平实地推进了对于文学世界的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在他们显然始终是主要的参照，是树立自觉认识的基地，也是超越传统的对象。

过分夸大当代批评撷拾西方文学观念和成绩，并不恰当。人们看够了“雁过长空”，然而，当代批评对于现代批评的某种反拨和补苴的意义，也是无法漠视的。尤其某些拥有相对成熟理性的批评实践，现代批评之于它们，并非是灰色的记忆，整合的自觉性使它们的表面叙述氤氲着芳烈的摩登气息，而骨子里却潜隐着中国人最为习惯的文学整体性的把握，一如在勃发形式研究兴趣的同时，大多又关注着同内容的联系。这些将有利于人们对当代批评的体认，也有利于对现代批评的思考和描述。它们至少告诉人们：漠视西方学术文化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所发生的深巨影响，固然是盲人瞎说，而轻视固有传统的力量，以及那种深刻得多的民族文化心理所凝集的潜能，同样是痴人说梦。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胎动于振荡的近代社会，虽说它和近代文学批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倘若没有近代文化所生发的课题，倘若没有它的那层苦涩和沉重，也就绝对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集中锋芒，以及风发的意气。从器物，而制度，而思想，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者向西方学习的路子，自然一程不如一程，不过，终于带着深重的教训把问题的症结推到了历史的前沿。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包括文学批评在内，正是在近代社会最薄弱最显痛苦的终点开始其生命史的。鲁迅用他的艺术创造揭示过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以改造国民性表达了他的伟大怀抱。“开启民智”，拥抱着近代向现

代过渡的背景,正是那个时代的旗帜,它作为根本性的任务成为中国文化向现代化发脚的篇章。《新青年》同仁们,那批站在历史前列并开辟了中国文化新纪元的优秀知识者,他们在最初阶段的努力毫无例外是以此为中心课题的。在文学批评领域,关于白话语体文的倡导和“人的文学”观念的张扬,处处显示着中西文化的对比,既光大了近代曾有的,更是提供了近代所无的,使批评获得了合理的现代性。西欧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俨然是中国现代第一期批评家的理想,他们的劬劳为着批评的解放,直然也是人的解放,生动体现着批评对人的自由精神、创造力量的确信和呼唤。

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从表面看,“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家最初的理论兴趣集中在人的思想观念问题上,相当深刻地接受了近代变革运动的历史教训,并且还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化反封建的切入口。但他们无法漠视日趋凋敝的社会现实,也最终无法摆脱传统中国知识者的文化心理规范。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昏暗,并没有影响西方的人文主义者执著追求和呼号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活跃在本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者在热衷宣扬西方个性主义学说的同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忘情或超然于社会现实。倘若西方人文主义者显示的是某种探究的批评心态,那么,中国现代批评家们难以改变自己作为中国知识者的立场,他们倾向于拥有某种关怀的批评心态。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那种数千年来为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起来的实用理性精神,使他们习惯浸润于对国事民瘼的关怀和参与社会政治的热情之中。“五四”文学批评实际上最终没有给自身提供独立自足的品格,而很快因敏感于现实社会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着群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的意志和愿望。尽管现代中国始终存在着某些可以归属于自由主义,以标榜个性主义批评的派别,但骨子里却潜藏着不少的政治关

切,表现为批评对现实社会需要的特殊选择。当时的陈独秀便有句名言:“你们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们”^①。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是根本性的特点,它既出诸对传统的反叛而显示出现代的体貌,同时也没有离开对于传统这一活的存在的尊重和依赖。作为一种本由西方文化催生的中国新批评,它曾经对西方古典主义批评有相当的心仪,也表现出关注西方浪漫主义之后批评新潮的宽阔视野。不过,实际的历史昭示,外来的任何批评观念和范式都程度不等地经过中国化的过滤和变形。现代文学批评和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突出地表现在它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批评的摭拾,以至于最后服膺马克思主义批评,这几乎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它对中国现代批评的决定性意义,恐怕只有用笛卡尔唯理论、洛克经验论、莱布尼茨唯心论对于法、英、德国近代批评的意义来比仿。需要强调的在:同它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其它部门的作用一样,它所包括的历史唯物论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对现代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巨。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它的那些关于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接受和实践。

对于拥有深厚的实用理性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是他们最感兴味的了。重视真理的实用性和现实性,曾经使“五四”时期的批评家心折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但是不久他们中的大多数先后转入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对世界未来图式的预言,同它的创始人对客观规律性的渴求相适应,而对于客

^① 《谈政治》。

观规律的膜拜，恰恰也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所强调的内容。最先以茅盾为代表的“为人生”的批评，是最值得重视的倾向，它从文学思想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开拓了自己光荣的道路，后来经由苏联和日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中介，并且还借助于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批评理论的泛滥，渐次登上了现代批评的主流地位。

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实用性异常强烈的批评，“致用”的观念决定了它并不依赖批评的纯粹性，因而也缺少类似西方那样的专门批评家。在中国，不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他们的第一等身分是职业革命家，因此，他们普遍将文学批评看成是革命实践的一部门，看成是革命实践的工具，是不难理解的。即便那些不是那么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中间不乏专门学者，但他们文学思想根柢中也满贮着实用主义的气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本意与实用相去甚远，但它们一到中国批评家的嘴边便生发出相当实在的意味。逃避现实不仅是他们的初衷，而且还是他们的根本人生态度，不过是借着批评把自己装扮成“看客”来保护自己罢了。他们短少积极的干预精神，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逐实用论者的立场，大抵是一批消极的软弱的实用论者。大体而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用性，具体显示为批评和读者的联系，它首先是一种为着读者的批评，其次才是为着作者的。“批评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使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布，……发扬和净化他的大多数读者的口味的工具”。^①说这句话的是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拥戴的人物，而他的意见并不太悖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用心。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第164、167页。

实用批评的发达,诗文论、诗词话的多至恒河沙数,本是中国传统批评的突出现象;在现代,批评家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依然保持着深浓的兴趣。这一历史时期的批评,当然包括有属于思想史的内容,但似乎更和同时期具体的创作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主要是以创作实践的需要为前提的。许多理论课题在西方具有独立发展的前途,而在中国基本上被强调为从属于现实文学运动的应用性。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当代精神驱使多数批评家力图通过文学批评促进实际的革命运动。文学批评是思想斗争的武器之一,是它的既极端又合逻辑的发展,从最高形态上概括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动力和价值。一般地说,作家作品批评不再是一种“个人”的活动,社会环境的精神趋向和现实要求全面覆盖了批评家对作家作品品评,也简化了批评家复杂的批评心理。与此同时,作家作品批评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问题思考,普遍地用文学的社会性来排斥文学的艺术性,用文学所属的一般意识形态本质来代替和消融文学的特殊本质。鲜明而逼仄的价值观念召唤批评以鉴别和推断文学的社会功用为自身的切入点,甚至是全部思索的终点。就作品批评,表面上对内容与形式有所分别,底里却多尊奉内容一元化,形式仅仅处于从属的地位,于是也生出了批评标准上的不适当的提法。就作家批评,世界观对文学观的全面替代,作家的社会思想立场,作家对实际社会革命服务的直接性,成为主要的判断依据。作家作品批评在现代中国的这种命运有它值得夸耀的地方,它从批评的一个职能方面突破了历史的格局,然而,它同时也牺牲了批评本性上的丰富,造成了与世界文学批评表面上的共时而内容上的相当特殊的性状,极度发展了中国文学批评自先秦以来的实用传统。

为着强化文学与生活内容的同步关联,特别重视文学与社会

的比照，几成现代中国批评家与生俱来的法门。他们的作家作品批评一般表现为并不纠缠于阐述创作主体的特殊性，对作品的结构也少却相应的热情。他们最初从西方找着了丹纳、斯达尔夫人、圣伯甫、朗松、勃兰兑斯等等援手，而后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意见中汲取灵感和方法。普列汉诺夫所言的，“历史和他的社会制度向我们说明了它的文学”^①，大体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命题。它极大地满足了文学批评对社会现实干预的渴望，从而焕发出芳烈的当代精神。这是一种基本上属于还原的批评类型，以生活的真实性规范艺术的真实性，旨在解决属于文学现象的社会历史因果关系，也即普列汉诺夫再三阐发的是一种“客观的批评”，由它的历史必然性的立场，稀释或删削了关于艺术内部的各种纷争，拥有最集中的渗透力。普列汉诺夫同时还补充过，这也是一种“政论式”的批评，它不粘着于文学一隅，而对环绕文学现象的社会思潮表现出锐利的敏感，对它的起伏消长有极大的审美兴趣。这种批评类型大抵可归属于注重文学外部规律之一路，它发育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它们的影响范围及其力度，用任何方式表达都不会太过。由它也生成了现代中国批评的新成分。某些职业革命家，甚至某些领袖人物也在文学批评领域拥有显著的地位，他们那些从时代的哲学和社会思考的高度提出的看法，充分激活了现代社会还原批评的活力，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局面。

中国现代批评的发生，本是为应和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多元发展的潮流，力图打破相对封闭的中国传统批评的，但是，因着时代的原因，更是因着批评家自身的心智结构和实践态度，终于展示出越来越纯化的过程。传统文学批评和外来文学批评的营养在实用

^①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一卷，第348页。

理性的深层统合下,得到了全面的抉择和演化。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它们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深刻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体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同其它意识形态部门的历史一样,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然而,对于拥有静止而大一统文化规范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来说,他们似乎已习惯于理论的巨大包容性,历史突出的课题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一体化理论的追求,用抽象的概念来笼盖文学的具体规定。虽说在现代中国,批评与创作始终胶着一体,但当批评为自己设置了一套规范性的概念体系,并以此作为创作实践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评价尺度时,批评家享有了自己的权威和圣洁,同时却又将自己推入了一个自身封闭的怪圈之内,从而失却了永不满足的创作探索精神。不能怀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中已经和将要显示的生命力,然而这种“不能怀疑”呼唤着科学和理性。三十余年的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也出现过偏向,即当我们正确地指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时候,较少对文学的反映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反映作深入细致的分别。这种偏向也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准确的把握,仅仅满足于应用性的论证和机械的维卫立场,缺少将它不断丰富、发展的热情。这些都是斫伤科学理论实践性的偏向,内在地与批评的实践目的性相分离。当代文学批评的部分内容所显示的某种平实的反思眼光,所以值得尊重,主要在于它们不陶然于历史的光荣,同时也不讳疾忌医,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发挥着它的关于联系的、综合的方法的优越性。

三十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历史以反思近代文学批评课题并突破其固有传统格局开始其生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民族文化心理背景的巨大力量又赋予现代批评的特殊个性。由全面接纳西方批评学说服务于社会现实的选择,最后统

一于政治革命的深入,大体存在过三个时期:理性时期、综合时期和权威时期。三个时期的起迄与现代史并不同步,也不完全相类于一般现代文学历史的分划,明显有其特殊的标志。

理性时期(1917—1925)。这是一个突破近代文学批评,严重改变中国传统本体批评的时期,全面向西方洞开门户,追求与世界共同批评话语接轨。强调理性,注重启蒙是其主要的标志。世界现实主义批评理论开始扎实地落下根基,但西方其它批评流派的阐介也相当广泛。本时期无像样的宏观批评,而大量微观批评在具体性状上已从传统的形式中分离出来。《新青年》同仁的发难,继之而起的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人生派批评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艺术派批评,是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

综合时期(1925—1942)。这是一个由全面开放渐次向着有重点地选择并予以综合的时期。它的第一阶段以革命文学的倡导和闻一多、梁实秋诸人的新人文主义批评为标志。它的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深入,直接发育形成了三十年代的三大批评板块:左翼批评、京派批评,以及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全面清理文学批评界,并且最终占有主流派的地位。理性时期的视界开始收缩,借着苏联文学界对遗产清理的成果,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批评先后得到中国批评界的重视。本时期已有相当出色的宏观批评,新人气息浓烈,不过,重外引而轻内举,重共性揭示而轻个性分析,已为普遍的倾向。

权威时期(1942—1949)。这是一个文学批评密切配合实际社会革命的时期。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学问题的看法,从面临的实际出发,以政治标准为

前提全面统合了自“五四”以来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大众化、民族化、现实主义三大主题，民主根据地、国统区和香港地区三大批评家群体的实践，集中反映了《讲话》的指导性意义。当然在局部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注重社会演绎的还原批评达到了颠峰，部分还溢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用政策的方式推出政治—文学的批评体系，从而规定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根本走向。

第一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先导

任何一种文学事实对文学整体来说,都只有“阶段”和“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新的文学事实,也无法摆脱历史既成的条件。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发难,从文学批评领域看,既是近代批评的尾声,又是现代批评的开始。他们的全部努力基植于某种沉重的反思,而其根本性的主题是启蒙主义。

近代中国启蒙主义思潮的形成历经半个世纪,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极渐次走向末路的产物。从最初龚自珍充满忧患和叛逆的诗文到梁启超“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的呼号,对数千年所沉积的传统的迷信终于开始动摇。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中国人将他们的眼光投向西方,发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于是,西方的异端邪说,由“夷狄”而“西儒”,由“野蛮”而“先生”,随器物——制度——观念,一步一叹地深入,近代启蒙主义的萌芽也发展为拍岸排空的壮潮。这股潮流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无论在地主阶级知识者内部还是在已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地主阶级贰臣之间,基本的原动力都集中在变革救国上。因此很难说近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是自觉的,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它直接是救亡图存的工具,不啻救亡图存的需要。即便在